

THE CALIFORNIA IDEA AND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1850 to the 1960 Master Plan

加利福尼亚思想 与美国高等教育

1850—1960年的总体规划

[美] 约翰·奥伯利·道格拉斯 / 著
John Aubrey Douglass

周作宇等 /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加利福尼亚思想 与美国高等教育

1850—1960年的总体规划

[美] 约翰·奥伯利·道格拉斯 / 著

John Aubrey Douglass

周作宇等 /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责任编辑 庄 严
版式设计 贾艳凤
责任校对 贾静芳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加利福尼亚思想与美国高等教育: 1850—1960 年的总体规划 / (美) 道格拉斯著; 周作宇等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8. 1

书名原文: The California Idea and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1850 to the 1960 Master Plan

ISBN 978 - 7 - 5041 - 3938 - 2

I. 加… II. ①道…②周… III. 高等教育—教育事业—研究—美国—1850—1960 IV. G64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9472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 - 2006 - 3492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邮 编 100101

传 真 010 - 64891796

市场部电话 010 - 64989009

编辑部电话 010 - 64989235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奥都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9.75

字 数 463 千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译者序

理想的生成与迁移

——加利福尼亚思想与中国高等教育

传统的大学是少数精英为满足“闲逸的好奇”而追求学术的“乐园”。它与社会保持着有尊严的距离，尽力抵制来自政府和市场的压力与诱惑。然而，到了近代，伴随工业革命的成功，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经济和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知识产业凸现，现在世界的运作越来越依靠知识和它的应用，这就要求高等教育从社会生活的边缘走向社会生活的中心，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站”和“服务站”。与此同时，个体要想在不断复杂的技术市场获得成功，就必须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尤其是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接受高等教育将不再是少数富人和智力精英的“特权”，它将成为多数人都应享有的“权利”。正如克拉克所指出的那样“高等教育将越来越少地为用于造就精英阶级服务，而将更多地服务于创造一个相对没有等级的社会。”

为了应对经济发展和民主化的诉求,高等教育被寄予厚望,不断卷入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它越来越被要求在构建知识社会和民主社会中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就需要对高等教育的结构和功能进行重新审视和界定,以满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要求。在这一方面,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体系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典范。它比较成功地解决了高等教育发展中面临的规模与结构、竞争与合作、效率与公平、管制与自治等一系列问题,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尤其是加利福尼亚总体规划,它不仅对全美,而且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影响。许多国家把它当作一个典范来进行研究和学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进行了若干国家高等教育规划的研究,该组织指定把加利福尼亚作为一个“国家”进行专题讨论。对我国而言,加利福尼亚的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然而,我们需要谨记的是,任何外国经验,只能做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伍尔考克和普里切特指出,“最佳做法”这种心态经常产生功能失常。一个在世界某个地方很成功的做法会立即被广泛宣扬,成为一个典范让世界其他地区仿效。^①成功的项目通常是特定的,任何地方的决策和实践,必须采取“因地制宜”的做法,使用当地的知识解决当地问题。这就提醒我们,在学习一种“最佳做法”的时候,首先需要对产生这一“最佳做法”的“本地知识”进行详细的了解。约翰·奥伯利·道格拉斯博士的《加利福尼亚思想与美国高等教育》为我们达成这样的目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

《加利福尼亚思想与美国高等教育》是对加利福尼亚公立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系统研究。作者借助丰富的史料,通过细腻的描述,坚持较为客观的态度,对加利福尼亚公立高等教育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清晰的梳理。它并不仅仅是对高等院校成立和发展的单纯纪实,而是把加州高等教育的发展置于淘金热潮、资本主义发展、进步主义改革、经济大萧条、世界大战、冷战以及教育产业等宏观社会背景下,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把加州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加州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我们打开了一幅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历史画卷。

透过这一历史画面,作者为我们勾勒出加州公立高等教育系统结构和功

① [美] 弗朗西斯·福山. 国家建构: 21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79-80.

能不断演进的历程。从早期服务于宗教目的到现在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引擎,从最初高等教育处于“愉快的无政府状态”到后来政府力量的逐步渗透,从着力于培养精英阶层,到向大众开放,从结构、功能的单一化,到结构、功能的多元化,加州公立高等教育体系积极、主动回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努力均衡教育规模与教育质量、政府与公立高校之间的关系,构建起独特的高等教育三级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成为实现加利福尼亚以及美国人民光荣与梦想的重要工具。

然而,加州公立高等教育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它的发展历程充满了一系列复杂的冲突和斗争、妥协和退让。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学院派对实用性学科的抵制,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控制与高等教育的应变与反抗,不同派别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均衡,初级学院、州立学院的扩张与大学之间的矛盾等等。正如作者所告诫的那样,如果读者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以为它记载了一段缓慢而理性的政策决策过程,那就错了,加州公立高等教育系统的扩张与其他现象交织在一起,激烈的争执,权力角逐、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对经济变化的迟缓反映、低估形势、不计后果的荒谬决策等等,这些因素构成了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发展的宏观背景。

除了对加州公立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外,道格拉斯博士还对加州高等教育以及美国高等教育未来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讨论。他指出,由于政府职能的转变、高等教育成本的增加、入学规模的激增以及教育技术在人才培养中的广泛应用,这些将会改变美国未来高等教育的格局。在作者看来,历史上的良药并不是灵丹,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创新源于对过去的理解,对未来的思考。

我国自1999年开始实施高校“扩招”政策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急剧扩张时期。高等教育的总规模和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快速增长,到2006年,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达到2500万人,是1998年的4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2%,这意味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已经开始。与此同时,建设一流大学的序幕也徐徐拉开。应该看到,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在观念和结构上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和冲突:优秀与平等、规模与质量之间的争论依然存在,不同类型院校的办学定位趋同,政府、学校、市场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很好地理顺等等。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问题与矛盾在一定意义上正在中国重新上演。中国高等教育将如何发展,成为迫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

加州高等教育思想带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其一，不同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共性的一面，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体系，无论是其发展历程，还是最终形成的总体规划，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和分析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如高校与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类型院校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参考；其二，高等教育的发展深深根植于它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造就了不同的问题情景，即使相同的问题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因此，简单的移植并不可取，而真正需要的是在借鉴和学习外来经验的同时，对“本地知识”进行认真总结和切实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知识的转化。本书对于了解和研究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周作宇（前言、导论、第一章）；杜瑞军（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李庆丰（第六章、第七章）；熊春文（第八章、第九章）；张学文（第十章、第十一章）；徐雪燕（中文版序言、跋、附录、注释和索引），本书最后由周作宇统一校对。

此外，章建石、张红伟、胡荣堃、赵宇新、刘雪平、杜云英、张玉凤等同学在校订、索引、注释等方面协助做了大量的工作。教育科学出版社的庄严女士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多次与译者和作者联系，认真审阅全稿，提出许多修改意见；教育科学出版社的领导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译者、校者水平有限，本书的翻译可能还存在一些不准确的地方，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2007年8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中文版序言

尽管中国和加利福尼亚在面积、文化和制度上存有显著的差异，但就高等教育系统入学率增长和规模扩张而言，双方都面临着共同的机遇和挑战。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各国政府和大学领导都在为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增长和教学质量的提高而奋斗。

在美国，州一级的研究机构是全面分析高等教育入学率、管理水平、教育质量及其社会角色的最重要的机构。在高等教育领域，联邦政府（位于华盛顿）发挥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大量资助——为基础科学研究提供经费，这些资助能促进美国多元教育的形成和发展。美国的高等学校目前在全美招收的学生比例近 80%，这些学校由各州政府管理。联邦政府只是为它的发展提供一般性的指导，并赋予各教学机构充分的自主权。

《加利福尼亚思想》一书追溯了加利福尼亚当初创建高等教育体系的历程，并探索了其中的缘由。加利福尼亚率先建立了包含两年制社区学院、一系列地方性大学和高品质的多校区研究型大学在内的连贯的高等教育体系。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体系的创建事关一系列颇具争议的政策制定和机构创建事件，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体系也因此造就了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高等教育典范之一。正如本书随后所论述的那样，它同时也是连

接个人行为观念和更广泛的政治文化世界的政治事件。

加利福尼亚不是唯一提倡大众高等教育理念和把公立大学作为当地以及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动力的州。但是，毫无疑问，加利福尼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

加利福尼亚和美国

美国建立公立高等院校的努力可以追溯到早期的“高等教育在民主社会中的角色”的论战。它在 19 世纪中期就庄重地拉开了帷幕，远远早于在二战后才开始关注此问题的世界其他绝大多数国家。尽管各州政府建立高等教育体系的步伐并不一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州的步履趋向一致，相关的学术界领袖共同提出了五项相互联系的大学核心职责。这五项职责的内容有利于阐述和理解我所提出的“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概念。从本质上来说，这一概念体现了他们对大学职责的全面理解。^[1]

五项职责都对公立大学的招生产生了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它们都在 20 世纪早期以不同形式出现，并且至今仍对当前有关高等教育机构未来发展的讨论产生影响。随着社会和公立大学的发展，每一项职责都经过了最广泛的修正。“社会契约”的组成部分包括以下一些内容。

1. 公立大学的建立和发展得到州政府的特许，并由州政府提供资助、辅以管理，所以公立大学对州宪法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初衷现在已经由于与日俱增的联邦政府基金的影响而开始渐渐瓦解，并且由于现代全球化的压力而更加动摇。

2. 公立大学有责任作为更大的公立教育系统的一员和合作伙伴。公立教育系统包括公立学校以及近期出现的新型高等教育网络。事实上，历来的公立大学就有扶持其他类型的公共机构的特殊职责。

3. 公立大学必须通过建立清晰的招生入学标准（或条件）鼓励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任何社会经济背景中的公民，一旦满足其入学条件，理论上就应允许其入学。同时作为一项辅助措施，公立大学应该主动降低入学门槛，在某种程度上，还应扩大入学学生的范围，使包括低收入人群和弱势群体在内的学生进入大学。

4. 公立大学提供的学术课程和专业课程必须与个人和社会相联系，必须与地方经济和各州经济相联系，特别是在现代社会，要与国家经济和世界

经济相联系。

5. 随着各州人口的增长和变化,公立大学必须要与其他的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合作,扩大招生规模,增设学术课程。

今日美国是发达的、多元高等教育机构的发源地。私立大学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举足轻重,而且通常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名校,例如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但事实上,当社会政治精英的创造性变得极其重要时,这些私立大学和其他一些小规模的为特定阶层服务的私立大学,其招收的学生仅占全美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很小一部分。2006年,美国非营利性的私立院校招收了全美大约16%的学生。

当然,在美国也有营利性的大学,它们主要提供某些领域的学位课程,例如商业课程、精选出来的少数专业课程和纯粹的职业课程,同时也提供越来越多的网络课程等。它们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招生人数也在逐步上升。然而,这些大学目前的招生人数只占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5%,而且主要为年龄较大的学生提供服务——在美国,这被视为继续教育市场。

公立大学是美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主要提供者。全美近66%的文理学士学位、约70%的科技领域的学位都由公立大学授予。同时公立大学还培养了美国大多数的工程师、医生、教师和律师。在美国,80%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就读于公立大学,这一比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还将可能增长。^[2]另外,多校区公立大学招收了大多数学生。2000年,美国3/4的本科学生被分布于38个州的近50所多校区公立大学录取。^[3]

我相信,美国公立院校的未来仍然与美国未来经济的成功和作为民主国家的尝试休戚相关。随着美国人口的持续增长,国家教育委员会的一项研究预测,如果国家入学率保持稳定,那么2000—2015年间,美国进入得到认证的公私立院校的人数将大约增加220万。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当前传统适龄人口(18—24岁)的入学率和年龄较大学生(≥ 25 岁)的入学率都太低。如果全国的入学率只体现了教育发展最好的各州的状况,那么到2015年,美国进入得到认证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人数也将增加103万。

上述巨大需求的满足将主要依赖于美国的公立高等教育体系。让我感到担忧的是,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都没有完全理解这一观察结果。其原因之一在于非营利性的私立院校并不打算扩大招生,而且它们扩大招生的能力也十

分有限。相反，营利性的私立院校更有可能扩大招生。但我怀疑，这些院校将主要面向继续教育市场，因为这一市场成本最低、收益最高。毫无疑问，美国公民教育机会的获得将依赖于公立高等教育的繁荣与发展。

鉴于美国公立高等教育仍是提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最主要场所，以及鉴于更大的政治环境要求，一个国家的公立院校必须占据支配地位、得到有效的管理。公立大学需要担负完全不同于私立大学的责任，以满足更大的社会需求。在中国，人们集中注意力关注、比较各国的公立大学是非常睿智的。据此，我们可以最大程度地发现双方的相似之处，从而有利于公立高等教育的改革和管理的创新。

营造一种不断进取的文化

毫不夸张地说，各国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都将取决于高等教育的规模和质量。公民的才能、职业培训和创造力是促进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其重要性不亚于一国的自然资源、战略地位、军事实力、政治地位或文化影响力。作为第一个倡导大众高等教育的国家，美国从根本上为这一观点提供了证据。

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是如何解释各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和其竞争力的呢？难道他们都认为主要原因是公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繁荣与成熟吗？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缺少能够为社会蓬勃发展、兴旺发达而辛勤工作的人们。同时，美国社会存在一种文化追求——这种文化追求认为个人有权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提高自身能力、增加个人学识、提高个人技能和社会地位。

在美国，发展人力资本有益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认识源远流长，甚至可以与美国历史相提并论。正如本书随后描述的那样，加利福尼亚不但率先认识到这一基本事实，而且还是第一个为增加高等教育入学人数而调整大学体系的先驱。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才开始提供研究证据，表明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加里·贝克尔（Garry Becker）和舒尔茨（T. W. Schultz）提供的证据世人皆知：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期间，不断发展的学校教育对个人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同时接受大学教育的劳动力的收益率高于其他任何诸如机械之类的单项投资的收益率。同时，他们还指出，接受大学教育的个人收益率将远高于仅接受中学教育的个人收益率。^[4]

随着人们对高等教育和技术革新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感兴趣,贝克尔、舒尔茨和其他人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促进了关于人力资本的形成和教育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的研究。1999年,克劳迪娅·戈尔登(Claudia Goldin)和劳伦斯·F.卡茨(Lawrence F. Katz)的一项研究估计:20世纪的美国,大约1/4的劳工收入源于个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5]

同样,戴维·密什(David Mitch)也发现,整个19世纪,虽然欧洲对中学教育和中学后教育的投资效果不如美国显著,但也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6]经济学家埃汉南·赫尔曼(Elhanan Helpman)解释到:“教育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全国个人收益的差异有着重大影响。”^[7]这一断言很适用于那些上过大学的人,因为有证据表明在那些大学毕业生云集的城市里,工人的工资要高于其他城市。赫尔曼认为“这说明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高于个人收益率。”^[8]

近期的相关研究同样说明了大学入学率的重要性,也解释了大学入学率是如何提高个人和社会收益的——这些收益对国家至关重要,特别是那些已经进入后现代经济的国家。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特别是那些获得大学文凭的,其所获得的个人收益在持续增长。^[9]过去五年,所有美国人的薪水普遍停滞不前;与此同时,美国大学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的终生收入差距仍然在继续拉大,而且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中,美国在此方面的差距最大。毫不奇怪,大学毕业生和中学辍学者的收入差距也在显著扩大。^[10]2004年,25岁以上、拥有学士学位的劳动力个人年平均收入为48400美元,而那些只获得中学文凭的劳动力个人年平均收入仅为23000美元。^[11]

此外,那些已接受大学教育的个人就业率更高,而且其进行社会、经济流动和获得更高地位的机会也更多。同时,与其他人相比,他们的寿命更长,参与选举的比例也更高。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和从大学毕业的可能性也更大。这其中,有一个最本质的原因,即这些人的子女继承了来自父辈的文化资本,从而促使他们普遍期望接受教育和追求自我完善。^[12]

按理,高等教育高入学率所带来的社会收益更为重要。大学教育提高了劳动力的素质、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促进了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还降低了社会失业率和所需的福利救济。大学教育还可以降低社会犯罪率,促使社会更为宽容,同时也促使人们积极参与选举和增加慈善捐助。这些都是大学教育普遍具有的贡献,得到了各国政府、大学领导及其拥护者的广泛认可。

表 1 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

	个人收益	社会收益
经 济	经济流动性更强 终生收入更高 就业率更高 个人储蓄水平更高	经济更均衡 失业率更低 生产力水平更高 劳动力更具弹性 社会福利救济更少
社 会	社会流动性更强 健康水平更高/寿命更长 子女的经济水平/身体素质更高 消费水平更高	社会更公平 社会更宽容 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更积极 慈善捐助更多 犯罪率更低 下一代接受教育的比例更高

资料来源：约翰·奥伯利·道格拉斯，大学入学条件：公立大学的招生、平等和社会契约（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7）。

中美比较

加利福尼亚建立高等教育体系的努力有哪些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呢？

国际组织，例如经合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供的数据表明，中美两国的高等教育进程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2000 年，中国公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 6 年，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为 12.25 年。然而，近年来形势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特别是中国年轻一代的受教育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02 年中国中等教育入学率大约为 67%，美国为 92%。很明显，中等学校及其教育质量、入学人数、毕业率是扩大高等教育的基石。高等教育入学率部分地反映了不同水平的中学教育入学率。过去，中国高等教育传统大学适龄（18—24 岁）人口入学率约为 12%。近期的数据则显示这一比例可能已飞跃至 19%（数据有待核实）。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增长。美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为 38%，其中包括相当比例的 24 岁以上的学生，这些人通常学习面向职业的课程或继续教育课程。

中美两国的招生规模同样反映了双方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差异。中国人口大约 13 亿，近 800 万的学生进入高等教育学习；美国人口近 3 亿，大约 1900 万的人进入大学学习。加利福尼亚是美国人口最多、经济产值最大的

州（如果加利福尼亚是一个国家的话，它的经济产值将排名世界第七）。它的人口总数约为 3500 万，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为 290 万。在这里，约有 90% 的学生进入三大公立高等教育体系学习。

显然，相对于美国而言，中国正处于大众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起步阶段。例如，1920 年，美国大学适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刚好超过 8%。到 1930 年，这一数据上升至 12% 多一点——大约与中国 2000 年高等教育入学率水平持平。到 1960 年，由于政府大力投资多校区大学和致力于高等教育体系的建设，美国高等教育入学率跃升至 20%。如前所述，2006 年大约达到 38%。

同时，与其他包括印度在内的经济转轨的国家相似的是，中国十分强调建立大学理工科课程体系。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据估计 2005 年经济增长率大约为 9.8%）、国家对高新技术的大力投资建立了大学和工业的共生关系，两者紧密联结。^[13] 结果，尽管与美国和欧盟的许多成员国相比，中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较低，但这不是决定性的，如中国现在就职于某些研发机构的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就相当可观。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经济相关部门的研发人员有 81 万名，美国大约是中国两倍。但是中国工程师人数的上升水平与美国相近，同时也可与大多数的欧盟成员国相比拟。^[14]

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

美国高等教育入学率显示，尽管美国缔造了大众高等教育，但是美国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扩展脚步却在放慢。长期以来，数以万计的大学和相当高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一直是美国教育经验的亮点。然而，相关指标表明美国中学后教育的入学率处于停滞，甚至下降的状态，特别是年轻学生更为明显。与欧盟许多成员国和由 30 个发达国家组成的经合组织的成员国相比，美国已经丧失了它过去所拥有的领导地位。

今天，（美国）出去兼职的学生更多，选择二年制学院的学生也更多。最富有的学生选择进入四年制大学学习，而来自低收入甚至中等收入家庭的学生则更倾向于选择进入二年制学院学习。他们获取学士学位的可能性很小，而且与过去相比，他们现在获得学位的年限也要长得更多。^[15]

相反，在经合组织成员国内，平均高达 50% 的年轻人接受中学后教育，而且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注册旨在获得学士学位的本科课程。与其他工业化国

家相比,美国于2002年进入中学后教育体系学习、并且完成学士学位课程或更高学位课程的人数比例的排名仅为世界第13位。^[16]换句话说,美国高等教育入学率相当具有竞争力,但是最终获得学位的人数并不多,而且在下降——特别是那些人口众多、分量又重的州。

为什么美国的入学率——最为重要的是学业完成率——排名相对在下降呢?不断上升的学费和学生债务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回答上述问题,但这并不仅仅是某些人所说的唯一因素。人口变化、贫穷人数的上升、政府投资的缺乏和高等教育成本的不断增加都已粗略地反映出来。但是,也许危及中学毕业率的最致命因素在于巨大的收入差距和种族差距。^[17]

中国新的起航

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正进入一个新阶段,而且中国正有意识地致力于高等教育体系的建设和扩展——这其中不仅借鉴了美国经验,而且不断借鉴其他的国际模式,还不断加强同国外大学的交流。中国近期的高等教育改革展现了一个新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新的开端尽管带有中国特定的文化、政治背景和需求,但是也反映了国际社会有关高等教育体系发展的共识。近期,中国中央政府部门将有些权力下放至各省,建立双重管理机制;同时大学和其他各种高等教育机构实行了一系列重大合并,将原来的612所大学合并成250所。

在中国,学费被看作获取大学收入多元化的一条途径。近年来,大学在学术课程开发建设和管理上被赋予了更多的自主权。同时,为满足市场经济不断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高等教育机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已经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制定了更富战略性的计划。一项相对较新的成果就是加强地方各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期间建立多校区大学体系的成就。多校区大学的各校区共享资源,管理结构相似,有利于效率的提高,正如本书将要描述的那样,该组织形式那时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出现。

一定程度的分权、不同的大学使命、向高质量和多选择的综合性大学的迈进、将高等教育机构看成共享价值观的公共网络,以及扩大大学入学机会、加强大学学术课程发展的自治权要求,历经一个半世纪的沉淀,如今这些都反映在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体系中。这些都反映了加利福尼亚体系历经

一个半世纪所形成的方方面面。

如上这些，可以说是高等教育体制至关重要的基石。对这些基石的建立不应简单地着眼于培养富有竞争性的劳动力和满足直接的工业需求，或塑造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市民群体，或创造新知识上，虽然它们都非常重要，然而，内涵更为宽广、更为重要的目标在于营造一种文化需求。因此，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包括拓展学生进入高等教育的多种渠道，加强学生在高等教育内部的流动，这才是根本。此外，目标明确的高等教育机构也是同样重要的：包括既重研究又重教学的综合性大学，更多职业导向的高教机构和为那些还没有发现自身才能或者有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机会的开放型学院网络组织，这些都囊括在更大的高等教育系统中。

中国的机构改革以及不断发展的学术自由和国际学者交流，为中国高等教育创立了一个新的开端。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它不但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根本，也与中国社会未来文化的发展休戚相关。与此同时，中国处于向入学机会更为广泛、发展更为繁荣的高等教育体系迈进的起步阶段，这也意味着中国将面临着众多的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包括：

为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提供入学机会；

满足城市和农村人口的教育需求；

在劳动力需求和学位培养之间保持平衡；

建立财政资助体制，以便资助大学优秀学生、减轻学生和家庭的沉重债务负担；

提高大学的经营管理水平，以便提升大学质量；

大学的长远招生规划和课程的增设进程不应太快（这一主题书中随后会详细提及）。



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当初创立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体系的先驱们都曾碰到过上述这些挑战，并且这些问题在今日仍十分突出。我们无法寻求通过一劳永逸的组织结构和终极途径去平衡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和质量。一般来说，这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范式——即高等教育和政府、企业、社会共同联合试图对技术、劳动力需求、攸关国家和世界发展的新知识的研究和生产进行

预测，并做出反应。

一般而言，加利福尼亚经验代表了美国建立高等教育体系的经验。或许，加利福尼亚经验当中值得关注的另一项经验是建立满足社会需求的大学网络系统需要长时间的努力。它不但要求大学要具备愿景、拥有长期稳定的财政投资和保持稳定的学术团体——促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创造性和试验；而且它还要求在学术自治和政府管理，特别是公众监督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

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最终都要对每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运行和发展担负责任。但是，它不能，而且是必须不能只将高等教育简单地等同为如交通运输或者卫生保健一类的社会服务或公益品。一个明显的趋势是那些拥有最发达的高等教育体系和拥有教育质量与产出水平最高的大学（例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国家，在重大学术决策自主权和大学作为公立机构所应担负的责任之间有一个适当的平衡。美国大学在如何建立高等教育机构和杰出大学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经验，但这种借鉴并不是单向的。

确实，随着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各国越来越达成共识：文化追求的营造对促进社会凝聚力 and 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高等教育机构及其生命力、教育质量、入学机会是保持文化抱负和扩大文化追求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